

漢書



95
K234.042
3
2:1

汉书

上册



C 034037

标 点 陈焕良
曾宪礼
责任编辑 李润英
封面设计 许康铭

汉 书 下 册

〔汉〕班固 撰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199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数：750,000 印张：34.625 印数：1—6,000

ISBN 7—80520—376—8/K·84

定价：（平）16.50 元（精）19 元

（湘岳 93—1—1/2）

湘新登字 007 号

（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承印厂调换）

95
K234.042
3
2:2

古典名著普及文库

汉书

下 册

标点 / 陈焕良
曾宪礼



岳麓书社



C034040

BA 27 / 20

出版说明

《汉书》问世近二千年，历代流传的版本很多，但迄今较为通行的，则要推景祐本（《四部丛刊》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北宋景祐本）、汲古本（明代毛晋汲古阁刊本）、殿本（《四部备要》所收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）、王本（清人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本）及中华本（中华书局1962年版繁体、直排、标点本）这五种，其中以中华标点本在读者中影响较大。

岳麓书社收入《古典名著普及文库》的《汉书》（简称岳麓本），是以景祐本为底本，参校上述诸本整理而成的简体字排印本，分上、下两册印行。

岳麓本之所以选景祐本为底本，以后出诸通行本为参校本，主要是考虑到景祐本有近古存真的特点：后出诸本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误文，是景祐本所没有的；后出诸本有不少隐而不显的误文，景祐本则较少。景祐本虽亦难免有讹夺倒衍之文，但这类误文大多亦存在他本之中，仅有少数属景祐本独误。我们相信，只要能广泛而审慎地吸收诸家考证、校勘的成果，完全可以依靠诸本互校，将景祐本的误文勘正到低于后出诸本的程度。

本书的校勘，主要是利用不同版本来比较异文，择善而从，其中也慎重地吸收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。现就本书在校点工作中的有关具体问题，作如下说明：

(1). 凡底本与参校本不同，而又以底本为是者，则经从底本，不出校记。

(2). 凡以参校本或其他材料（如诸家考订成果、出土文物新证等）为依据而改底本时，用小一号的字体加（ ）标出底本中应删改的文字，随后用〔 〕标示所增补或校正的文字。凡增删改乙之处，均在附于下册书末的校记中，简要说明校改的根据。

(3). 一般情况下，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，异体字一律改为正体字，但部分专名用字，则仍其旧，以免歧义。

(4). 古体字和通假字，一般不改为今字和本字。但为了方便读者，同时减少刻字之烦，则将某些较生僻的古字，径改为今字；而某些通假字，只要有参校诸本用本字者，亦据以径改为本字。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，特将未改动的古字、通假字摘录若干，并将其相应的今字、本字附注于括号内：

禽(擒) 章(彰) 跳(逃) 豪(毫) 罢(疲) 什(十)
 桀(杰) 畴(俦) 畔(叛) 僂(戮) 骖(委) 竟(境)
 伯(霸) 仄(侧) 昏(婚) 历(析) 颛(专) 常(尝)
 姓(生) 向(响) 爵(雀) 风(讽) 县(悬) 景(影)
 蚤(早) 媿(悔) 盩(戾) 冯(凭) 涂(途) 离(罹)
 廷(庭) 填(镇) 密(谧) 欧(殴) 微(邀) 女(汝)
 鼂(朝) 知(智) 织(帙) 姗(讪) 慊(嫌) 徇(殉)
 沈(沉) 然(燃) 濯(棹) 底(砥) 错(措) 虚(墟)
 领(岭) 寓(宇) 娄(屡) 说(悦) 说(税) 廛(仅)
 廛(勤) 队(坠) 队(隧) 髦(牦) 髦(旄) 亡(无)

亡(忘) 才(材) 财(才、材、裁) 乡(向) 辟(避)

乡(响、享、飨) 见(现) 适(嫡) 振(赈) 很(狠)

(5).底本中,同一人名或地名,往往有不同写法,本书正文不求一律。在下册末所附《人名索引》中,已将不同写法、不同称谓的同一人名,分别归并于其主目后的括号内,以便读者检索。

最后,需要坦诚向读者说明的是:《汉书》这部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,在千百年来的传写、刻印、流传过程中,积误颇多。虽经历代学人考订、校勘,而留存至今的某些文字、标点上的疑难问题,仍非一时所能断然解决。总之,我们只希望在前人辛勤劳作的基础上,尽可能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一个便于阅读与研究,并便于收藏的《汉书》读本。但是,限于校点者和编辑者的水平,岳麓本《汉书》仍难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,敬请专家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一九九一年四月

前 言

陶懋炳

我国史学名著中，《汉书》仅次于《史记》。岳麓书社将《汉书》详加校勘整理，纳入《古典名著普及文库》出版，对于广大读者发掘《汉书》精华，推陈出新，振兴我国史学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，应当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。

(一)

汉武盛世而有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东汉光武、明、章之治后又有班固作《汉书》。这是饶有趣味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当然，两部史学名著的出现并非偶合，两个“盛世”也绝非简单的重复。

汉武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由胜利而确立、巩固的标志，当时，国内实现了空前的、巩固的大统一，封建制度支配地位的完全确立，封建经济出现了第一次繁荣盛况，这一切，都是东汉初不能比拟的。但是，值得我们注意的，倒是东汉初对西汉后期的种种调整、变革、强化。如世家地主的兴盛，独崇儒术局面的完成，等等。不同的时代，产生自己的文化代表人物和他们代表时代的巨著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和班固著《汉书》，恰是

如此。

班固的家族与司马迁迥异。据班固《汉书·叙传》自称，班氏本楚贵族后裔，楚亡迁于晋、代间。自其七世祖起，逐代上升：由边地豪富而致位郡县，至曾祖班况而以大臣名家占籍长安，姻娅皇室；至其祖父一代，有通经术、致位二千石、入居侍中者，有承赐秘书之副者。时人称其家“倾动前朝，薰灼四方，赏赐无量，空虚内藏”。直至两汉之际，其父班彪虽未登显要，却还是“家有赐书，内足于财”，“好古之士自远方至，父党扬子云(雄)以下莫不造门”^①，他成为当时一位有重名的正宗经学家。东汉初建之际，班彪先后奔天水、河西，依隗嚣、窦融，窦融举河西归汉，班彪实与其事，而两家从此荣枯休戚，息息相关。

班固(公元32-92年)，班彪子。承父经术史学，少负重名。明帝时除兰台令史，迁郎官，典校秘书。章帝时，更受赏识，“数入读书禁中，或连日继夜。每行巡狩，辄献上赋颂。朝廷有大议，使难问公卿，辩论于前，赏赐恩宠至渥”^②。章帝建初四年(79年)会诸儒讲论五经于白虎观，作《白虎通德论》(即《白虎通论》)，令班固撰集其事，成为白虎观经义的主编。和帝永元元年(89年)，窦融孙大将军窦宪伐匈奴，班固为中护军，参与谋议。汉军大破匈奴，追逐金微山，班固撰《燕然石铭》，闻名后世，至今仍被珍存。永元四年(92年)窦宪因罪诛。班固为

① 《汉书·序传》

② 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

其亲信幕僚，受了自家豪富外戚习气的影响，“诸子多不避法度，吏人苦之”，^①甚至其家奴都敢干洛阳令种兢车骑，乘醉詈骂。至是，种兢借机罗织，班固死于狱中。

虽然班固不得其死，但班氏家族却没有因之降低其声望地位，班固所撰《汉书》仍为皇家赞赏，组织人力，完成全书。原来自《史记》成后，续作者甚多，班彪以为此辈多鄙俗浅陋之徒，不足以继成，乃继采前史遗事，旁贯异闻，作《后传》数十篇。未成，班彪病歿。班固居父丧，整理《后传》，欲竟父业，为人告发，坐私改国史罪下京兆狱，书稿尽没入官。其弟班超为之申诉，明帝阅书稿，甚为嘉赏，释放班固，归还书稿，召任职兰台，撰当代史。后又命他完成父业，班固遂改通史体为断代，表明他旨在为汉家颂扬功德，断代为史，把汉朝地位凌驾秦上。于是，甚为皇家赞赏，跟司马迁撰《史记》的命运完全不同。班固死，其书中的八表和《天文志》犹未完成，和帝命其妹班昭续其事，后又增加马融兄弟为助手，始完成全书。所以清人赵翼指出，《汉书》之成，历时二十五年，由四人完成。《汉书》之成，多由朝廷支持、组织，故它的命运远胜《史记》。

(二)

班固不足与“中国史学之父”司马迁比高挈大，然而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后继者往往能为前人拾遗补阙，甚或完善前人所创事物，立不可磨灭之功。《汉书》之与《史记》，正是如此。

^① 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

《汉书》最足称者，在于其对编纂方面的贡献。班固撰《汉书》，开创了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，将《史记》开创的纪传表志体裁进一步完备起来，成后世正史不祧之宗。《汉书》本身称书，乃改《史记》所立的“书”为志。又因汉代异乎春秋战国，大一统之局，何有列国可言，乃废世家，并入列传。《汉书》所载，始于汉高帝元年（公元前206年），终于王莽地皇四年（公元23年），共230年的历史。全书本百篇，后人分为120卷。十二帝纪为西汉历代皇帝编年大事记。八表中有“古今人物表”与体例不合，最为后世訾议。十志有律历、礼乐、刑法、食货、郊祀、天文、五行、地理、沟洫、艺文等，内容不限汉代，堪称由三代至汉的典章制度、经济、文化史，适足以补《史记》之不足。

班固撰《汉书》，体例胜于《史记》。这些体例在当时有其道理，对后世很有用处。如：《汉书》废《项羽本纪》和《吕后本纪》，目的在突出正统思想，为汉家辩护。但是，我们且不论《项羽本纪》，《吕后本纪》之废，还是有点道理的，她并没有践祚称帝呀！这就是汉代儒家的《春秋》之义，可以说是“无秩序中的秩序”。又如，把各种列传的称呼、次序理顺，较《史记》为清晰。《八表》、《十志》影响后世，这里就不说了。

《汉书》以博洽见称，除体例之外，又体现在搜集资料丰富、选用适当。如：（1）《汉书》较《史记》后出，故能得到前人未尝闻见的资料，其边疆族列传和外国传，较《史记》内容大增，有的是新开撰的。（2）《史记》好奇，《汉书》务实，故《汉书》多用对策论政之文，如《贾谊传》不载其赋而载《治安策》，《晁错传》

载其募民徙塞下等疏奏等。清人赵翼称,“《汉书》多有用之文”,确是中肯之论。(3)《汉书》后出,资料远胜前人,又兼收诸家成果,故能对《史记》作一些甚有价值的订正:《史记》未载因嘲笑项羽“沐猴而冠”被烹杀的说士姓名,《汉书》考订为韩生。《史记·李将军传》云,李陵降匈奴,汉闻匈奴以女妻之,遂族其老母妻子;《汉书》则载明:汉闻李陵教匈奴为兵,遂族其母妻子,后查明,教兵者乃李绪,与李陵无干。似此之类的订正,尚有多处,甚有裨益于学者。

班固承家学,成为当时经学家中的巨擘,他标榜其父“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”,因而,在当时或后来的一些朝代,在经义方面诘难《汉书》者不多见,只是唐宋以后,情况才有变化。《汉书》多古字古义,这是难度较大的学问,在撰写过程中,女史学家(也是经学家)班昭受命完成其兄未竟之业,就对她的助手、弟子马融兄弟面授。后来,东汉有服虔、应劭注解《汉书》,各为音义,魏晋而降,此类注解更多,至于唐初,颜师古(581—645)作注,征引注本已共有二十三家。颜师古总结前代成果,其功甚巨。宋以后注《汉书》者,以近代人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最为人称道。稍后,杨树达先生撰《汉书窥管》,把《汉书》注解引到了一个科学的新境界。研究中国历史(尤其是古代史)不读《史记》不行,不读《汉书》也不行。这不是虚声恫吓,不读这两部巨著,毫无中国文史素养,不识字,不通掌故,甚至连成语都一窍不通,贻笑大方,而曰“弘扬民族文化”,岂非“我谁欺?欺人乎?欺天乎?”

《史记》的文学价值,可说中外并颂,久而弥高。就是在我

国古代，文学家们也是称颂不已的：宋代文学家苏轼称司马迁“文章多奇气”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明末清初罹祸惨死的文学家金圣叹称《史记》为“第一才子书”。至于《汉书》的文学价值，却很少有人议论。然则，《汉书》只有语言学的价值，少有文学价值吗？不然。《汉书》写人、写事，颇具匠心，细腻深刻，引入深思。

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，记了一件为人们所忽视的小事：“光为人沉静详审，……每出入下殿门，止进有常处。郎窃识之，不失尺守。其资性端正如此。”

妙得很！把霍光那副形象写得入木三分。其他如《赵广汉传》写其苛察、残酷、希指伺意、专横跋扈，如见其人。《张禹传》写其贪恋富贵、趋炎附势，为王氏效劳的卑劣面貌，令人读后欲唾其面、批其颊而后快。如果说写这些人难度不算大，那么，班固在《李广苏建列传》中写李陵、苏武，确实用了很多心血：关于李陵，传中叙他与数十倍于己的匈奴骑兵殊死苦战，录引司马迁为之申辩的言词，字里行间渗透了对李陵的深切同情和惋惜。他在记昭帝遣使匈奴，欲招李陵归汉时，李陵默然不语，“孰（熟）视而自循其发，答曰：‘吾已胡服矣！’”又对使者说：“…归易耳，恐再辱奈何！”笔墨不多，实为神韵之笔！至于写苏武饥食旃毛、渴饮冰雪的爱国者高大形象，较诸写李陵，却又容易多了。

不读《史记》，不识司马迁之奇才卓见。不读《汉书》，不知班固之博洽。学问之道最忌一偏之见，兼收《史》、《汉》之长，乃古今治史有成者的通衢，不可忽也。

(三)

我们说上段末的这段话，绝不是不论是非、不别黑白地兼收并容，而是要在明白是非，辨识精华、糟粕的前提下，善于抉择，广事吸收，作实事求是的探讨。

著名学者扬雄曾在称赞《史记》为实录的同时，指斥太史公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。（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）班彪则说：“……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，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，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。此其大蔽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然善述序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文质相称，盖良史之才也。”（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）班固评司马迁，全是承父之说。但此议一出，后代史家不满者越来越多，驳议者逐朝有增，有的史家颇有卓识者，如南宋郑樵在这方面就过了头：他呵骂班固专事剽窃，全无学术；他认为班固与司马迁相比，不管猪与龙相比；乃至就其结局讥贬，成了人身攻击。其他诸家言论，各有毁誉，也有某些合理处，但就整个来说，他们的言论有的并非重要问题，有的则并无意义，一句话，没有触及要害和根本。“五四”以后，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史学界评议马、班，颇有成就。目前，可能又出现一场新的争鸣。这些，我们暂不多说，拭目以待。

五德终始、天人感应，乃是汉代儒家的特点，无论西汉的司马迁或者东汉的班固，都不能脱此道。然而，如将他们等量齐观，于各自对祖国文化史（尤其是史学史）所起到的作用和贡献不加区别，则也是不当的。

处在“罢黜百家、独崇儒术”的汉武帝时代，虽然形势严峻，但法网还不那么周密，加上当时百家争鸣的余烈尚存，即使儒家诸派也还争论炽烈。所以，司马迁一面信仰五德终始、天人感应，一面却怀疑天命神意，并且怀着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卓见，终成一家之言，不但垂之不朽，而且久而弥高。班固处在儒学统治地位已固的时代，尤其是宣帝、章帝两次讲经，光武帝奖图讖，文网周密，远逾西京，作为正宗经学的泰斗，班固撰史，当然要“惟圣人之意尽心”了。他承袭了前辈阴阳五行、天人感应之说，以此来论述西汉一代历史。他反对《史记》将汉代“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项之列”，而强调“汉绍尧运，以成帝业”，遂断代为史，将汉朝凌驾秦朝之上。由于他将秦、新（王莽）两朝置于“闰位”，从此，正闰之争便开始了。读者或许要问，《史记·汉高纪》中不是有刘邦斩白蛇、乃赤帝子之说吗？那么，汉承尧运，以火德王之说，不是司马迁开始吗？不然，此乃西汉元、成而后，续写《史记》或改写者窜入，嫌疑最大者是班彪，请参阅拙著《中国古代史学史略》115页。《汉书》多方宣传神秘论，用以神化封建专制皇权；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九家之源皆出官府，实际上旨在为汉朝壅断学术、罢黜百家立论；至于其论货殖，斥游侠，与《史记》截然不同，其坚持愚民、坚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，更是明显的。不承认这些，岂能区别精华与糟粕？

我们指出班固和《汉书》的这些缺陷，并不认为班固和司马迁是势不两立的学派。他们都是汉朝的士大夫，都立志为幅员辽阔、民族众多、宇内一统、亘古仅见的大汉天朝纪颂功德，

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；处于自然科学贫乏、分割闭塞的中世纪，他们处在各自不同的处境中，思想往往自相矛盾。诸如此类的共同处，不一而足，不可忽视。

与欺世媚主之徒迥异，班固这位正宗史家，虽以说教为职事，但并不徒事空言，专尚谈词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不但可以成为信史，而且颇多中肯之论，故能垂之后世，成为史学名著。

《汉书》宣扬天命，比较集中在《高祖纪》和《王莽传》。

其论高帝，“性明达，好谋，能听，自监门戍卒，见之如旧。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。天下既定，……虽日不暇给，规摹弘远矣”。这当然是论人事而非言天命，而在《赞》中，除了为刘氏编排为唐尧之后的大系外，便是这几句称说天命的话：“汉承尧运，德祚已盛，断蛇著符，旗帜上赤，协于火德，自然之应，得天统矣。”

对开国之主称颂天命，而嗣君后代，则又是另一个调子了。《汉书》论史之可贵处，应当说这是一个重要部分，我们试举数则以明之：

《惠纪》：“孝惠内修亲亲，外礼宰相，…闻叔孙通之谏则惧然，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，可谓宽仁之主。遭吕太后亏损至德，悲夫！”立论中肯，又有分寸。如果说《惠纪》还不足见班固的识见，则《文纪》、《景纪》、《武纪》、《宣纪》各有精到之处：

《文纪》踵效司马迁记遗闻轶事之有特殊史料价值者，然后说：“专务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内殷富，兴于礼义，断狱数百，几致刑措，呜呼，仁哉！”

《景纪》：“……周秦之敝，网密文峻，而奸轨不胜。汉兴，与民休息。至于孝文，加之以恭俭，孝景遵业，五六十载之间，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醇厚。周云成、康，汉言文、景，信矣！”

这些论赞确实承继了《史记》的优良传统，而在《武纪》中云：“如武帝之雄材大略，不改文、景之恭俭以济斯民，虽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何有加焉！”显得冷静、公正，实为可贵。

至于叙论孝宣，对他以平民身分得重回皇家、继祚为帝，写了一些委曲情况，其中主要是表明他是天命所归者，而在《赞》中则完全汰除了这些，一则曰“孝宣之治，信赏必罚，综核名实”，再则曰“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”，然后说：“功光祖宗，业垂后嗣，可谓中兴，侔德殷宗、周宣矣。”应当说，这也是一篇佳论。

作为正宗史家，班固撰史，既要宣扬天命，又不能把一切尽归之天命，而把人完全视为天意支配下的玩偶。在汉朝，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尚处在青春时期，班固所代表的阶级、阶层和政治势力，还是颇有生气的，故其气派也自与后世（尤其是尾闾）不同了。

笔者识浅，兼以病榻命笔，谬误必多，尚祈多方教正，幸甚幸甚。

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